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财长督促中国加速经济改革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2 年 5 月 3 日报道，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于 3 日发表言论督促中国政府加速经济改革并放手让人民币升值。盖特纳的此番言论发表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他还表示了对中国财政改革计划的支持态度。这一改革将会增加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帮助力度、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但是他同时示意中国需要在改革道路上进一步加快速度。对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问题，盖特纳表示承认在过去的两年里人民币对美元比值上升了 13%，但是他认为，为了中美两国长期的共同利益，人民币对美元比值需要继续上升。

帕内塔促国会批准《海洋法公约》以应对南海问题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2 年 5 月 9 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将施压美国会参议院通过联合国 1982 年的《海洋法公约》(the 1982 United Nations Law of the Sea treaty)，强调通过此法案的重要性。最近，美国政界不断有政客推动国会批准《海洋法公约》，认为当前美国批准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超过以往；批准该公约能赋予美国海军在公海以及外国专属经济区和外国领海行动的额外灵活性，这在亚太和南中国海尤其重要。但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反对急于批准该条约；认为该公约无法扭转现行的南海争端；而且，该公约还不利于美国在特别经济区开展军事活动，这关系到美国的最关键利益，加入和履行该公约对美国来说就很有可能是冒险。

美国会施压帕内塔提供详细中国军力报告

据美国会众议院网站近日报道，美国会众议院在 10 日晚些时候对帕内塔施压，要求五角大楼提供关于中国军力发展的详细报告。此前，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以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 10 日在五角大楼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表关于国防预算的强硬讲话，反对国会大幅削减国防

财政预算。随后，美国会众议院军事准备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Randy Forbes)当日就发表声明称，美国采取的措施目标是解决中国过去 20 年两位数的军事开支问题，以及“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地位”的问题。福布斯在声明中称，“政府为了避免挑衅中国政府，《中国军力报告》已经变成了一份政治文件，而非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实评估。”福布斯希望五角大楼的年度中国军力报道，能够添加亚太司令部高级军官收集的关于中国的情报。他还希望，这份军力报告能够对“潜在对手——中国与伊朗”的军事战略与军力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

美国会研究处报告担心西方对俄军售或流向中国

据法新社 2012 年 5 月 10 日报道，美国国会研究处近日发布一份长达 31 页的报告，该报告详细叙述了关于法国向俄罗斯出售 4 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交易，并称这是“北约成员国首次向俄罗斯出售的重要的攻击性军事能力”。报告认为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对俄罗斯的数十亿美元军售可能会造成安全影响。报告指出，奥巴马政府反对这笔交易，因为这“可能会向俄罗斯以及某些中东欧地区的盟友传递错误信息”；不过，华盛顿并未强烈反对这一交易，因为奥巴马政府将提升与莫斯科的关系确定为优先事项之一。该报告是应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卢格的要求而写的。卢格担忧这些武器可能会被用于对付美国的盟友，而且这些武器未来可能会流入中国。北约峰会将于 5 月 20 日和 21 日在芝加哥召开，而美国国会研究处在 5 月 10 日出台的一份报告无疑给即将参会的美国盟友出了一道难题。

《华尔街日报》鼓吹重建美在菲军事基地

《华尔街日报》2012 年 5 月 8 日发表题为《中国让菲怀念美军事基地》(Beijing Makes Manila Miss its U.S. Bases) 的文章称，中国外交部鲜有的“强硬措辞”使菲律宾感到不安；菲律宾或许应该好好怀念下“过去的美好时光”：当时，大量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士兵在美军驻菲基地上保卫着菲律宾的安全。该文指出，是否应该“重新激活”美国在菲律宾防卫事务上的作用，再次回到了菲律宾的议事日程上；而时任菲参议院议长的萨隆加(Jovito Salonga)也由当年的极力反对转变为保持沉默。文章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日益自信也使得美军驻菲基地“复活”的可能性大增。文章还指出，当前复杂的冲突令马尼拉在政治上十分“尴尬”。总统阿基诺三世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南海问题，一方面要避免同中国陷入战争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也需要表现得“强硬”，毫不让步。文章写道，没有人会认为只拥有“少得可怜的”战斗机和战舰的菲律宾军队有能力同中国强大的海军抗衡。同时，马尼拉方面认为中国也想尽量避免武装冲突。因此，如果菲律宾拥

有美国的实质支持，北京不动武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

白宫办公厅前主任等将出席马英九就职典礼

据多维新闻近日报道，美国在台协会 11 日宣布一个五人代表团将出席台湾总统马英九的 5·20 就职典礼。该代表团团长是今年 1 月底前卸任的奥巴马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戴利(William Daley)，团员包括曾任副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副顾问的史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长的史罗特(Ane-Marie Slaughter)、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 (Raymond F. Burghardt) 以及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III)。另据美媒此前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提南 (Ileana Ros-Lehtinen, R-FL) 还将率领一个由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乘专机前往台湾出席典礼。从历任美国总统安排美国代表团参加台湾总统就职的人员与级别看，这次的团长层级和上一次布什派遣的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卡德(Andrew Card)级别一样；但这一次不同的是，前国务院资深官员就占了两位——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美国务卿：朝鲜如欲对美展开直接外交需进行改变

据《美国之音》新闻网站 2012 年 5 月 4 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本月 4 日在正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发表言论，称美国有意与朝方展开外交互动，但条件是朝鲜的领导人须改变他们一以贯之的行为方式，“把人民放在首位”。她还谈到，如果朝鲜可以把精力集中到使人民获得温饱和受到教育方面，并且“重新加入国际大家庭”，那么美国将会“欢迎朝鲜并且与之携手合作”。克林顿同时赞扬了中国在这方面起到的作用，认为两大强国将会合作以促使朝鲜放弃挑衅性政策。

彭博社全球民调表明薄熙来案未动摇世界对中美关系的信心

据彭博社 2012 年 5 月 8 日报道，通过对全球 1253 名投资商、分析家和市场交易者进行了调查，该社于 11 日发布了本季度民意调查报告，结果显示：51% 的人对胡锦涛主席的经济政策抱有信心，这和今年 1 月份的调查数据相同，没有受到薄熙来事件的影响。68% 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今年将保持平稳或者有所增长，预期中国经济恶化的比例降至 30%，是去年 9 月份首次进行该调查以来的最低比例。72% 的人认为，无论是薄熙来案还是陈光诚案，都不会影响他们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只有 5% 的受访者担心中国来年的政治稳定性，另有 7% 的受访者称他们正在减少投资。调查表明，受访者对中国胡锦涛政府的信心强于对日本野田佳彦政府的信心，受访者还把中国金

融市场的表现列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受访者还就中美关系的走向表达了看法。72%的人认为，奥巴马如果获得连任，中美关系将保持不变，紧张程度如同现在。43%的受访者认为，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 11 月份击败奥巴马，美中关系将会恶化。还有 40%的受访者认为无论谁当美国总统，中美关系都不会改变。

中美有望对审计机构展开联合调查

据《华尔街日报》新闻网站 5 月 10 日报道，美国审计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周二（8 日）说，美国负责调查审计机构的人员最早可能于今年秋季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华开展工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简称 PCAOB)主席多蒂(James Doty)说，这是向中美调查人员对中国审计机构展开联合调查迈出的第一步。联合调查可能于明年开始。

重点关注

中国人蜂拥而至

编者提示：《国家利益》网站本月 7 日发表文章，对于近期来美国媒体对于中国经济势力日益扩展的过分担忧进行了相对理智的分析，表达了作者中肯的意见：

有关崛起的中国带来的危险的报道劈天盖地，压得人喘不过气。《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人已经来到了加勒比海滩。看看他们都胆大包天地做了些什么：中国人在巴哈马群岛建立一座价值高达 3500 万美元的体育场。你们难道还没感到惊慌吗？“小小岛国多米尼加接受了中国援建的文法学校、中国帮助翻修的医院以及运动场……安提瓜和巴布达接受了中国援建的发电厂和板球馆，并且中国正在帮其建一所新的学校。”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说“中国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展现了其经济实力。然而在离美国如此近的地方竖起中国的国旗导致了严密的审查，并且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竖起国旗”的目的昭然若揭，意味着捐赠国寻求征服受捐国。竖起本国国旗通常暗指已归属本国领土。在谷歌中搜索这一短语，首先弹出的画面就是日本人在硫磺岛竖起太阳旗。俄罗斯也对北极下面的海底采取了类似的行为。不过，迄今为止，还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对加勒比地区存有据为己有的野心。

《纽约时报》的文章接着解释称“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不存在安全威胁，他们指出中国并没有建设基地或组建任何军事联盟。”有人要问了，那些认为存在安全威胁的分析人士都有谁呢？确

实，如果中国真有全球性的军事野心，他们绝不会蠢到没在美国后院做好一切准备就暴露这样的野心。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中使用了“新兴超级大国”以及“意在侵犯”这样的字眼，而这样的字眼让人联想到了美国长时间以来所推崇的行为风格——利用对外援助和贸易为掩护侵犯他国。中国的动机似乎类似：表达善意有利于商业。这尤其符合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基础就是出口商品以及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资源。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两党组成的国会委员会）主席丹尼斯·希（Dennis C. Shea）表示称：“说到中国，必须要当心其行为背后隐藏的政策目标。”安提瓜和巴布达前外交官罗纳德·桑德斯（Ronald Sanders）补充说“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方式，那么美国几乎就要让自己跟这一地区不相干了。美国不会让自己的侧翼暴露出去。”因此他们在军事意向（暴露我们的侧翼）中多多少少表现出了一些偏执狂的症状……你从来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要干吗。

如果美国真担心中国的一举一动，那就让我们造更多的学校、道路以及体育场，超过中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应该保持冷静。想想当年日本猖狂地买下位于纽约市中央的洛克菲勒中心时所带来的恐慌和强烈不满，或许能帮助我们正确地对待当前的情形。我们的确能做到辨认真假。

最近，我们还了解到通过维基解密公开的美国外交电报表明西方外交官担忧中国的触角已经触及离美国不到 190 英里的地方了。但是他们担忧什么呢？来自体育场的噪音不会传播得那么远，新建的学校也不会吸引佛罗里达的学生。即使是政治支持，巴哈马群岛、多米尼加和安提瓜又能给予中国多少呢？联大的一张选票？选什么呢？我们为何要为此而烦恼呢？

不久中国就会在加勒比地区碰到在非洲、巴西和东南亚同样的问题——这些国家愉快地接受了中国馈赠的礼物但很快就会问：“最近你们为我们做过别的吗？正如美国得出的结论，对外援助和贸易并不会让受益国跟本国亲近。并且中国的用工行为也没有起到帮助作用：发展中国家抱怨中国人经常不雇佣当地人而是自己带工人，即使雇佣当地人，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很恶劣，工资很低，并且贸易条件十分不公。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最近在缅甸和越南发生的一些事件，中国的一些行为和提议让这些国家与美国走得更近了。简言之，中国的对外推进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挫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我局限性。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总是忍不住认为对手，即使不是敌人，潜伏在附近。以前是日本，然后欧盟，现在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对其构成了越来越多的威胁。各国通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造成了恶性的循环：一国心生疑虑，另一国将这种疑虑看成是对自己所担心事情的证

实，然后做出反应——导致相互间敌意渐增以及军事竞赛。我们现在被拖入了跟中国针锋相对的心理状态，美国著名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中国学者王缉思最近共同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就提到了这点。我们最好“保持冷静”——不必太担心，但要保持警惕。

（注：本文作者 Amitai Etzioni，曾担任卡特白宫（the Carter White House）资深顾问；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美智库专家称美国应习惯与变化的中国相处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常驻资深研究员卜大年（Dan Blumenthal）5月4日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题为《这等朋友》（*Friends Like These*）的文章。卜大年曾供职于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办公室，他在文章中对中美间一些捕风捉影的猜疑表示担忧。

卜大年在文章中指出，美国现在担心中国有朝一日会“统治”亚洲，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中国则带着深深的疑虑看待美国的“重返亚洲”，担心美国此举只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在卜大年看来，这两种疑虑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妥的。真正值得忧心的是中国政治的动荡——正如在最近的薄熙来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一样——以及美国国内民意所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的倦怠。北京不愿因中国的崛起招来美国的过度反应，一再向华府表示它“不想当老大”；而美国对中方的这种“保证”深表怀疑，一再“诱使”（cajole）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中国却将这种要求视为一种“圈套”，是美国妄图让中国陷入国际事务的茫茫泥沼中的大阴谋。

卜大年指出，中国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的“良性霸权”（benign U.S.hegemony），美国免费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不应对美国的亚洲“重心”过于焦虑而处处掣肘美国；而一个动荡、虚弱的中国也绝非美国的福音，只会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失却一个力能扛鼎的合作伙伴。因此，中美两国应急需认识到，对方的虚弱对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都是一种灾难。他同时也指出，中美在双边关系中并非纯然是虚与委蛇，中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是因力所不逮，过去几个月中国内政中隐忧还在困扰中国领导人；而美国则真诚地希望与一些国家携手共担国际责任，比如希望中国能在朝核问题中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但中国总是推诿迁延。他还指出，从薄熙来事件中可以窥见中共政治中潜在的风险，政权的交接远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纯熟而有序。因此，美国必须要准备好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中国。

卜大年指出，而对美国而言，中国的虚弱绝不是件好事，缺乏民主传统使得政治危机更具灾

难性。如果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尚且不愿承担国际义务，就更不要指望动荡、虚弱的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同样地，美国的衰落也绝不是中国的福音。尽管中国口口声声认定美国的亚洲“重心”就是为遏制中国而来，但中国人似乎忘了，中国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的“良性霸权”，中国的繁荣是搭上了美国全球治理的“顺风车”；一旦美国的这种影响力消失，中国将毫无疑问地陷入最深的麻烦。因此，中国现在更应该反思，如果没了美国世界将会怎样。如果没有一个大国站出来为大国和平提供基本的前提，如共享全球资源、威慑流氓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个世界将走向何方？在卜大年看来，没有美国的付出，中国的崛起将是空中楼阁。

综上所述，卜大年在文章中认为，当务之急是中美两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对手的虚弱是祸不是福，对双边关系和国际秩序而言皆然。因此，美国一方面应该制止一切危及中国稳定的动作，另一方面要力促中国进行民主改革以稳定国内的根基；而中国则不应在美国维护地区及全球稳定时处处与美国为难；相反，应该督促美国履行其对全球事务的承诺。

美国衰落的预言

最近，观点保守的评论人士马克·斯泰恩(Mark Steyn)充满悲观论调的新书《美国之后：准备迎接世界末日》(After America: Get Ready for Armageddon)登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书排行榜的第四位。彼得·D·基尔南(Peter D Kiernan)所著《成为中国的婊子》(Becoming China's Bitch)更是一度占据了亚马逊(Amazon)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

基尔南曾担任高盛(Goldman Sachs)高级合伙人长达数年之久。看到他的书名，读者也许会以为这是一本关于中美关系的具有煽动性的书。事实上，中美关系只是作者生拉硬凑的众多话题之一，该书主要讨论了美国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其中，只有第一大灾难与美中关系有关。而斯泰恩不仅认为美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他还认为“美国有可能被灾难吞噬，并遭受巴尔干半岛式的毁灭，整个社会将陷入崩溃”。他眼中的破坏性因素正是茶党右派一向所反对的：联邦开支过度、巨额债务、社会福利国家（他认为这种福利体系在使美国走向破产的同时，也令美国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政治伊斯兰；而头号问题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斯泰恩指责奥巴马效仿欧洲，让政府过多地介入民众生活，这种行为背弃了美国这片自由之地的精髓。

毋庸置疑，斯泰恩和基尔南的观点都符合美国的时代思潮，尤其与保守派人士合拍。右翼人士钟爱的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 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仍处于上升状态，前者的人数比后者多出一倍有余。所幸，并不是所有“衰落论”书籍都像斯泰恩和基尔南的著作那样缺乏说服力。托马斯·埃兹尔(Thomas

Edsall)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均有见解深刻的论著问世，值得多加注意。

埃兹尔是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政治类新闻记者。他在《紧缩年代》(The Age of Austerity)一书中指出，对资源的争夺将成为美国政治一个愈加重要的特点：“两大主要政党为维护各自阵营取得的福利和利益展开了激烈争夺。”他认为茶党是“富人的联盟”，它一心想巩固既得利益。从美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计划”(Social Security，养老金)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福利)——中获益最大的是老年人群。奥巴马提出要将全民医保写入法律，茶党将其戏称为“奥巴马医改方案”(Obamacare)。因为按照埃兹尔的说法，在一个紧缩的时代，它无疑对有利于年长“富人”的社会保障项目构成了威胁。

埃兹尔的关注点落在国内政治，而萨勃拉曼尼亚在其观点犀利的《日蚀》(Eclipse)一书中则将重点放在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高级研究员、现为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研究员的萨勃拉曼尼亚谈到，世界经济与政治将愈加以中国为中心。鉴于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萨勃拉曼尼亚提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观点——他认为这一时刻将在十年内到来。作者指出，中国的经济规模正逐渐赶上美国——接下来，它将迅速拉开与美国的差距。

而外交政策分析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美国制造的世界》(The World America Made)一书中对“美国衰落论”予以了反驳——而且他的观点在上层人群中获得了认可。美国总统奥巴马本人也十分欣赏卡根的大作。卡根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战后世界秩序中得到了发展，而维持这种秩序依靠的是美国的力量，而不是全球化或是科技的进步。但正是因为自由的世界秩序依赖于美国权力的支撑，故而卡根指出，这种秩序要比多数人想象的脆弱得多。假若美国的衰落成为现实，自由的世界秩序也将随之瓦解——就像古罗马衰败后，欧洲便进入了黑暗时代。一旦进入后美国时代，我们也许会发现“代替美国权力的不是和平与和谐，而是动荡与灾难”。

卡根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论点，称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保持了基本稳定；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的产出一直占世界总产出的四分之一左右。他是援引了美国政府的官方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然而，有其他资料显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急剧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直到 2000 年，美国的产出还占到世界总产出的 31%，而到 2010 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 23.1%。当然，并无明显理由证明，萨勃拉曼尼亚等人以及《经济学人》引用的比较悲观的数字必然比卡根引用的更为乐观的美国政府数字更准确。但卡根热衷于确立的论点主要是政治和哲学上的，不是经济上的。他引用的数据不过是他构建一个重大论点的基础。

我发现美国经济和政治实力消减、中国实力上升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在中东，美国正在结

束两场不成功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而且美国发现，它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威胁。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寻求紧急财政援助的对象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在非洲，中国的投资正在改变整个非洲大陆。即便在美洲，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上升：巴西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如今已超过它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在被卡根的文章所震撼之际，我想起了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美国喜剧演员）的经典笑话：“你相信谁？相信我还是你自己的眼睛？”这一次，我宁愿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本文作者吉迪恩·拉赫曼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编译自5月8日的英国《金融时报》）

（新闻部分编译：江宏春、王子磊等）

焦点分析

《国家利益》：亚洲安全对峙

核心提示：作者认为，亚洲安全的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资源脆弱性、维权意识和恢复其在东亚地区历来主导地位的决心，将使本地区各国对中国行为的担忧加重，并引起美日两国的对抗性反应。

人们很少能预料到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对于体系性的变化更是如此。但东亚现在有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面对中国的新挑战以及美国和日本相对衰退，美国主导下的旧秩序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如果美国外交政策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权力现实，或者中国不能适应美国和日本长远利益，可能会危及备受赞扬的亚洲世纪所带来的希望，使东亚恢复到其血腥和分裂的过去。在这个关键地区出现的局面将产生全球性的后果。由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所在地发生决定性的转移，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很显然，东亚对国际秩序从未具有如此核心的重要性。世界上的三大卓越国家——美国、日本和中国——前所未有的全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如果旧的秩序突然崩溃，这会令每一方的代价大大提高。

将近七十年来，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直构成这一秩序的基础，这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之时，并于四十五年以后由于苏联解体而得到加强。冷战期间，由于有关苏联军事实力的臆想和现实，美国在东亚的优势地位遭到破坏。此后，在一个短暂的“单极时期”，美国似乎能够随心所欲，而不用担心具有同等实力的竞争对手或起抗衡作用的联盟。回想起来，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可能被视为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的巅峰。从那时起，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它被十多年的战争、陷入困境的政治制度以及仍在徘徊的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削弱。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计划、让这一地区不受国防预算削减影响的努力，无法掩饰这样一个清醒的现实：美国影响东亚的能力已不如从前。

虽然日本一度被视为美国在东亚地区联盟体系的可靠北方支柱，并由于其可靠性和活力而受到称赞，但其二十年来的政治和经济萎靡不振则是旧秩序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2011 年遭到海啸重创的福岛核电厂近乎崩溃，这可被看作是日本日益内向型的政体受到腐蚀的隐喻。该国缺乏信心，并被一系列国内问题所困扰。领导能力方面的一潭死水使美国难以重振与日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使之无法确认日本的发展方向。这反映在冲绳的重要海军基地搬迁未能达成协议上。尽管日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体，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二十多年没有增长，该国 2011 年遭受的屈辱是，它被中国所超越，后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老化和萎缩，日本面临的前景是沦为二流的东亚地区中等强国，除非它可以恢复失去的锐气和目标。

但华盛顿丧失影响该地区事务无与伦比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拥有 14 亿人口，超过其他东亚国家和美国的总和，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千年来在亚洲一直是主导国家，现在也毫不掩饰其恢复从前地位的渴望。这些梦想不再是幻想，因为现代中国拥有实现这些梦想的战略影响力，其人口和经济使法西斯德国、日本帝国和苏联——它们是美国实力从前的挑战者，最终被征服——相形见绌。中国的重新崛起所带来的战略挑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美国——就此而言还有其他东亚国家所未曾体验过的。主要的未知数是中国领导人将会采取的道路。人们经常以过于直白和简单的措辞，把这个道路说成是在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和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之间二选一。事实上，中国很可能是两者兼具，既遵循国际体系的规范，但在其核心利益与这些规范相冲突的情况下除外。

虽然早就有预测——实际上，早在 90 年代中期，美国的政策规划者就提出了有关这些战略性影响的警告——但中国在东亚地区新近的卓越地位受到了最近发生的两起跨时代的事件的推动，一起是金融性的，另外一起是地缘政治性的。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许多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正受到帝国过度扩张和入不敷出的损害。这种看法也许言过其实，但由于美

国对中国负债超过一万亿美元，令美国显然陷入了一种明显不舒服的境地，被看作其主要竞争对手的金融附庸。看到美国在金融上的薄弱性显然使中国领导人变得有底气，在有争议的地方特别是在东亚谋求超越美国的地缘优势。最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显然决心要积极捍卫其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有争议的岛屿、水域和资源的领土要求。中国与日本和印度等其它亚洲大国的关系越来越经受着考验。许多东南亚国家担心，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日益强大，它在地区平等问题上只会说说而已。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宣布以其名字命名的南中国海为“核心利益”，并明确表示它将继续支持好战的朝鲜政权，尽管这个特立独行的国家一再挑衅和侵犯国际准则。

关于中国未来的军事意图，最令美国 and 该地区各国担心的问题是其野心勃勃的“远海防御”战略，旨在尽可能迫使美国海军远离中国海岸。中国一心要把其三支沿海舰队变成一支真正的蓝水海军，能够控制西太平洋，最终在中太平洋和印度洋投射巨大的海上力量。北京的战略目标似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门罗主义。它正在迅速获得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实力。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具有完美的战略合理性。毕竟，如果在 19 世纪，崛起中的美国能够制订一项门罗主义政策，作为阻止其它强国进入西半球的一项迟钝而有效的工具；那么 21 世纪崛起的中国为什么不应当在西太平洋谋求相应的结果？问题是，北京阻止美国海军前进的决心威胁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稳定，这不仅令与美国而且与日本的紧张关系升级。

中日关系已经陷入了紧张状态。双方看来都无法捐弃前嫌；这种情绪影响着其当前的行为，排除了任何真正和解的可能性，尽管日中贸易蓬勃发展，经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增加。这些潜在的紧张关系不时地爆发，暴露出两国之间的严重失和，凸显造成失算的可能性。最近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事例是在 2010 年 9 月 7 日。当时，东中国海上有争议的钓鱼岛（亦称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所引起的紧张局势恶化为严重的对抗，一艘中国拖网渔船故意撞翻了对其进行追捕的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船只。中日关系因此陷入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民意调查显示，双方相互之间的不满情绪极为高涨，87%的受访日本人和 79%的受访中国人认为对方国家“不值得信赖”。整整 79%的日本人认为中国是个军事威胁。

如果根据这些活动就推断——中国企图与美国和日本进行军事对抗，或者中国能够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则是错误的。但中国新的自信心显示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现存的秩序以及从前的优势国家的领地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结构性紧张。按照哈佛大学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北京大学贾庆国的文献记录，过去的五百年间，七场对现存秩序的霸权挑战中有六场导致严重的冲突。我们还知道，渴望成为霸主的国家和现任霸主之间强有力的经济与贸易联系本身并不会使冲突的风险减少，正如英国和德国一个世纪以前所显示的。当时，两国不断加

深的经济相互依存度没有阻止他们于 1914 年开战。因此，一项严重的错误是断言中美两国之间的不断加强的关系使彼此之间的军事冲突不可想象。

一些自由派认为，中国的独具特色、文化特征和历史经验使之与别国相比具有较少的内在的侵略性。根据这种观点，“中央帝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国家，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调门前进。然而，认为中国与西方或东方国家相比，历来就具有较少的侵略性或扩张主义色彩，这种看法经不起推敲。与许多强大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一样，中国具有领土扩张和征服或者胁迫邻国人民和邻近国家的悠久传统。虽然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性质不同，但中国朝贡国家体系的最后阶段一直是把一个宗主国君主强加给邻国人民和政体。而今天，其它亚洲国家的人们并没有忽略这一点。虽然北京把恢复与台湾的统一和安抚西藏看作是对祖先留下的、由于外国人背信弃义的干扰而丧失的土地重新行使中国的主权，但是可以得出一项截然不同的结论：北京对台湾和西藏的政策反映了中国可能会对更广泛的地区采取行动。当然，中国的复仇主义丝毫也不会使人们相信，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相比，中国统治下的和平会明显地更加公平、稳定与爱好和平。

但是，如果中国统治下的和平缺乏吸引力，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按照目前的形式无法维持下去，那么东亚地区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秩序，能够维持和平并满足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愿望？一种可能性是建立一个“亚洲同盟”。亚洲同盟者从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大国达成协议、主导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获得灵感，他们坚持认为，在没有一个主导国家的情况下，欧洲同盟的当代亚洲版本最有希望带来地区和平和稳定。然而，要想具有可信性和持久性，有权参加谈判的就只有最强大的国家。五个明显的候选国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尼。

这一模式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种可疑的假设，即东亚的小国会欣然同意，让大国来裁决它们个别的或集体的利益。这有悖于 20 年来东亚地区主义的整个发展方向，其重点在于赋予小国权力，以及对本地区安全问题的集体管理。这也忽略了伴随着法利德·扎卡利亚所说的“其余国家的崛起”，权力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中等强国要求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它们不会轻易接受恢复过去的大国主导状况的任何做法。此外，大国也很难同意接受亚洲同盟所设想的某种总管角色。日本过于虚弱；中国不愿意，其政治价值观也过于不同；印度专心处理本国问题；印尼的地缘政治野心只限于东南亚；美国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资源来承担起亚洲的加强版领导者角色。

而认为美国应当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把中国当作一个相等国家与之共享权力；这种论点又如何呢？并驾齐驱的 G2（两国集团）将会是 A2（亚洲两国集团），使北京和华盛顿划分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其方式很大程度上与美苏两国在冷战初期管理政治上分裂的欧洲时差不多。虽然美中

两国之间的权力共享具有表面上的吸引力，因为其有希望和平过渡到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但是这种共享不大可能成功，原因有二：其一，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会把权力拱手让给中国，就像中国反过来也不会这样做一样；其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并不是没有障碍的，其长期持续也没有保障，因为中国面临着环境、资源、经济和人口方面的严峻挑战，更不用说其对手美国没有显示出陷入长期衰落的任何迹象，尽管目前遇到了种种经济阵痛，北京可能比自己所揣测的更早地面对这样的前景：重新振作的华盛顿决心重申其战略利益。

因此，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如何才能确保良性竞争不会让位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加剧现有的不安全感并造成严重冲突的流血思维。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有权实现军队的现代化，维护其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北京坚持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要求的做法适得其反——疏远了邻国，提高国际上对中国的战略野心的关注度，引发该地区的对抗性行为。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海上实力的挑战触及了美国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继续保持太平洋的海军优势不仅对美国的安全、而且对美国作为全球杰出大国的地位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情况几乎肯定会引起军事和政治上的抗衡。

这里的问题在于，北京解决敏感的政治和主权问题时经常采取严厉、强硬的官方说辞，并且政府愿意接受、有时甚至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加剧了与美国和日本的纠纷，并使纠纷复杂化。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和全球关联的中国将意味着，外交政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以及外交部和国务院中一小部分人为外交政策提供支持的精英的专有领地。通过聊天室、博客和互联网网站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中美和中日关系的处理复杂化，也更加难以预测。当然，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被竞争对手妖魔化，正如美国 80 年代“抨击日本”的做法所表明的那样。但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梦魇在中国产生了严重破坏稳定的作用。在那里，耸人听闻和煽情的报道经常与西方小报相关，使得中国领导人很难不去讽刺美国的意图和能力，而不是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评估。如果北京尚未为新闻自由做好准备，它就必须为其控制的媒体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制订一项更加协调一致的战略，明确承认北京在资源方面的忧虑和由此产生的承担保护西太平洋上通道所需的更大责任。对于中国最近表现出的比较独断的行为，西方的种种解释都没有认识到的是，北京的经济严重依附于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它是国际贸易的一条主要渠道，并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和宝贵的海洋生物。到 2030 年，中国多达 80% 的石油和多达 50% 的天然气将通过马六甲海峡从海上进口。而马六甲海峡是一个传统的海上咽喉要道，航道狭窄而水浅，每天都有大量轮船通过，而且容易被封锁或者堵截。

中国的能源进口的增长率是史无前例的。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该国已经从一个石油净出

口国转变成净进口国，55%以上的石油通过进口，原油进口仅在2010年就惊人地增加了17.5%。这种资源的脆弱性给中国的决策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除了担心恐怖主义、海盗活动和本国能源供应遭到环境阻塞之外，还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对马六甲海峡和西太平洋绝大部分海域享有有效的海上控制。国家主席胡锦涛2005年谈到所谓的马六甲困境，第一次对此表示不安。中国官员此后一直明确表示，中国不再准备把西太平洋的海上航道安全外包给美国海军。因此，无论美国和日本喜欢与否，中国海军的航海信号旗将更为频繁的在西太平洋和马六甲海峡南部出现。这是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的一个自然结果，正如20世纪初期美国海军的出现预示着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

另外一种危险在于美国的行为及其对中国所采取的做法的种种矛盾。20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令人困惑地混杂着接触、合作、竞争、避险行为以及对中国国内政治结构的说教。由于对北京的不满和敌意不断增加，美国政府面临着挑战：即确保中国不会成为美国国内政策失误的替罪羊，或者取代苏联成为新的战略假想敌。任何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对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都会适得其反。这将削弱中国领导层中的温和派，招致相应的反应，从而加剧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

美中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所产生的战略意义将会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范围。随着竞争加剧，防止冲突升级并非易事。这未必是因为北京寻求领土扩张、已经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或在价值观问题上与华盛顿有严重分歧。这些问题大体上是可以控制的。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的资源脆弱性、维权意识和恢复自己在东亚地区历来主导地位的决心，将使本地区各国对中国行为的担忧加重，并引起美日两国的对抗性反应。这可能是半个世纪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斯·华尔兹所阐述的传统安全困境在当代的呈现：在谋求通过建设强大军队来增强自己安全的过程中，大国往往令其他每个国家感到更不安全，因为这种军事力量经常被视为潜在的威胁，而不是一项合理的防御措施。

目前，中国尝试通过“探测周边”来考验华盛顿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决心，这已导致美国可以预见的强烈反应。美国海军和空军正在制订计划，以采取一项新的“海空作战”战略，从而抑制中国导弹的强大实力，并使之变成瞎子。这项战略在华盛顿正迅速获得政治上的吸引力。而这种情况毫不费力地就可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将把对中国不断增强军事力量感到担忧的其它国家卷入进来。要想避免最糟糕的结果，就必须长期承担增进信任和预防性外交的责任，并建立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以防止本地化的纠纷和事件升级为大范围的重大冲突。

总之，东亚旧秩序的解体在该地区造成了一种脆弱的均势，而中国在本地区的野心则使这种

均势产生了内在的不稳定性，尽管这种野心也许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美国抱有同样可以理解的决心要尽可能地维护自己在该地区旧有的主导地位。在这个全球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美两国能否成功地应对这种脆弱的过渡，从而维护地区均势的稳定性，仍是摆在亚洲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个核心问题。

（作者 Alan Dupont 为澳大利亚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安全教授、国际安全与发展学院主任。）

美国大选无碍中美关系

美国第 57 届总统大选将在 2012 年 11 月 6 日举行，这是一个星期二。这次全民选举中，各选区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选举人，选举人在 2012 年 12 月 17 日选出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大选是当前报纸和电视访谈节目中一个最热门的话题。我将在这篇文章里讨论媒体报导的本质、内容和重要性，并探讨选举结果对美国经济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目前，奥巴马总统和罗姆尼之间的竞争旗鼓相当。谁会胜出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了解各类选民的偏好。选民可以按照性别、年龄段、种族、居住的州、职业等标准分类。例如，工人更支持奥巴马代表的民主党，企业家更拥护罗姆尼代表的共和党。青年和拉美族裔更愿意投票给奥巴马。在女性选民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平分秋色。据说女性选民的偏好会受她们更喜欢哪位候选人的夫人影响。这些信息大都来自 NBC、纽约时报、CBS 和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各种定期调查。调查会向受访者提问，以便在两位候选人中做出比较。这样的问题包括：谁更善于领导处理经济事务；自奥巴马执政以来，受访者自身的经济状况是否改善；受访者是否决定好了投票给谁，如果是，选谁。

在过去 30 年中，有一项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因素被广泛研究。这就是大选前 6 个月美国的经济形势。如果经济环境较好，能让选民满意，选民就更倾向于投票给时任总统。对这项因素的定量分析沿袭了经济学定量分析演变的轨迹，并促进了政治学定量分析的发展。现阶段，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因此经济因素并没有清晰地表明哪位候选人更具优势。虽然从好的方面讲，GDP 年化增长率已经超过 3.5%，但是失业率仍处在 8.3% 的高位，而且市场上能提供的新职位并不多。在挽救美国的汽车制造业上，奥巴马确实有功劳，因为 3 年前，就是在他的任内，对该行业提供了大规模资金支持。但同时，油价大幅上涨。两位候选人都能用近期经济发展上的证据来支持自

己。所以，我们还不能根据现在的经济局势预测选举结果。

对美国人来说，这次选举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一位来自共和党的总统可能会削弱联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可能会尝试终止一些奥巴马任内通过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包括要求全民购买健康保险的医疗保健法案。最高法院正在审核该法案的合法性，因为其部分内容可能违背了宪法的精神。这样的政策还包括限制华尔街经营活动的新监管要求。如果奥巴马连任，他不仅会继续落实上述政策，还可能允许政府在提高富豪所得税税率等政策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些政策尽管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美国经济活动的公平性，但在推动 GDP 增长上作用有限。

我还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对中美关系影响不大。两党都认为中国是个大国，都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在处理伊朗和北朝鲜问题这样的重大事件上，两党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此外，当前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球，因而，中美两国的竞争也不再局限于太平洋西岸，而是扩大到了世界各地。

（作者邹至庄，系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文章来源：2012年5月3日《金融时报》）

本刊作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